

神交

——师友周先生文中

江青

10月25日在纽约登机，26日抵达瑞典斯德哥尔摩时凄风苦雨，下机后打开邮箱，不料入眼的竟是文中儿子周浚岩、周疏旼的信：“沉痛地通知您，我们的父亲昨天上午在我们二人的陪同下在家里安详辞世。他一直身体状况良好，直到过去几天病情突然恶化。我们能够在他长达九十六年的不可思议的人生旅程中跟随他，而且能站在他身边陪他走到最后，为此我们感到无比幸运。……”突见噩耗，一时不能自己——我与文中1973年相识，亦师亦友近半个世纪！

10月中，才与谭盾、黄静洁夫妇去探望文中，他仍住在恩师法裔现代作曲大师埃德加·瓦雷兹故居中。由于临时起意，我只带了他平日爱吃的皮蛋瘦肉粥，静洁则在我建议下带上了上海糕点，以慰思乡之情。文中太太张易安2016年往生，惦念小时爱吃的中国零食，常写信给我，因为她不谙中文，就用英文形容一番，我就在中国城中寻寻觅觅，尽量满足她在最后阶段的一点心愿。这不禁让我想起外公，在最后的日子里念念不忘鲑鱼，于是全家人全力以赴地完成了他的念想。

那天，在我们再三央求下，文中只浅尝了一口粥就打住了，护理告诉我们周教授近来几乎不进食，看他弱不禁风的模样令人心疼。谈话中我发现似乎他对眼前的事有些模糊，一直反复在谈抗战时期在中国逃难的故事。一个小时后浚岩打电话给我：“爸爸不能太累太兴奋……”告别了一次、又一次、再一次，看他依依不舍的眼神，心中纠结得慌。

第二天就收到了文中助理给我的信，信的内容是文中对自己的衣衫不整抱歉，因为他忘了我们的约会，在匆忙中下楼。我跟文中交往以来，他永远干干净净从头到脚一丝不苟，从穿着搭配到音乐创作，从教学研究到文化交流。这样一个细节，到了九十六高龄还耿耿于怀不放过。他怎么会完全忘了几个小时之前才约好的见面时间？想到这里，不祥的预兆顿时向我扑来。

记得1974年，初尝试编现代舞，战战兢兢缺乏自信心。当我一口气编完第一支现代舞《阳关》（钢琴音乐柳色新），马上请作曲家周文中先生和此曲弹奏者周夫人张易安来SOHO工作室看排练。跳完后，我迫不及待地问文中：“你觉得我编的《阳关》是否与你用同一主题所作的曲相吻合？”至今仍清楚记得他的回答：“编舞者大抵不应当作作曲家这样的问题。我在写音乐时，脑中只有声音，记录下来的是音符，一切是纯听觉的，绝无任何视觉上的想象。而刚才，我经感到由纯听觉转为具象的形体，不免会大吃一惊，或者说感到不习惯。这是极自然的我这方面的直接反应。看后，我可以说不喜欢你《阳



上图：江青（右）与周文中，摄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。

左图：2019年10月6日，周文中与江青最后一次见面，后排左为谭盾、右为黄静洁。

关》中表达出来的意境。”这条艺术创作中的清规戒律，就是那次与文中谈话后领悟到，从此我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创作者合作，只是去了解或被了解创作意图、结构性设想，不敢再跨越之间的“雷池”一步。

屈指算来，我用了文中创作的音乐编跳了十支舞：《阳关》（音乐：柳色新）、《变》1974年群舞、1986年独舞、《行草》、《民歌三调》、《尼姑的独白》、《尽在春风里》、《嫦娥》（音乐：渔歌）、《青秀山川》（音乐：山水）、《落花时节》。有时我编舞是先有构想再找合适的音乐或请人作曲，但所有文中的作品，都是听了他的音乐有感而发创作的，连舞蹈的名称也都沿用了音乐原名，音乐和舞蹈之间或者说舞者和作曲者之间，可以称得上“神交”。

在我有想法和构思时也邀过文中给舞作曲，但他身兼数职实在太忙了。于是他热心认真地推荐他以为合适的音乐来作曲。那时中国还没有开放，他介绍了柬埔寨学生Chinary Ung作了十四章的组舞——《传统与变调》及《……之间》；韩国学生Kilsung Oak作了舞剧《乐》。

无论是用文中的作品，或用他推荐的学生作曲，他都会关心创作的进展，每次排到一个程度，我就会请他们夫妇

来工作室看排练，回想起来那是自己创作最旺盛的阶段，文中无疑是我在现代舞创作上的引路人！

易安走后，如果我人在纽约，常常会烧了菜去探望文中，但他绝不提易安，我提到易安时，他会拿起包了布的大槌，在书房中猛击大锣一下，锣鸣震醒，余韵久久不散，文中似乎陷入回忆中，轻声说：“你听——这就是我和易安的交流！”“嗯——我懂，这是神交！”

1974年，我介绍雕塑家蔡文颖、培蒂夫妇与时任哥大艺术学院院长、一代中国现代音乐先驱者周文中夫妇相识。大概被彼此强烈搞艺术创作的热情互相感染，尽管属于不同的创作领域，但趣味相投，我们不知不觉结成谈文论艺惺惺相惜的朋友。我们有共同的浓重中国“情结”，想把身负中西传统背景的海外华裔艺术家联合起来，担当起不可推卸的桥梁作用。于是成立了“中华海外艺术交流委员会”，这当然是周文中在哥大主持纽约哥伦比亚大学“中美艺术交流中心”的前身。

“江青舞蹈团”筹划1974年在纽约亨特大学剧场秋季公演，当时我在亨特大学任教，只需要付极少的场租。把握这个合作机会，文中、蔡文颖和我取

得共识：与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合作，能融合经验出新境。在反复讨论后，决定以由恒动的宇宙观做基础的《易经》中八卦的经验推论来作为首次合作的主题。文中早已创作了音乐《变》（Pien），音乐中运用了中国古老的哲学思想易即变幻不居。而蔡文颖的动感雕塑也完全可以《易经》来诠释：宇宙万物由太极而生，太极中有阴阳，一如电子中的正负两极，一旦相遇就起变动。我用了八位舞者自己领舞，与二位大师、工匠合作过程中，领悟到好东西，得到许多启发。

1975年秋，在林肯中心参加文中音乐《韵》的首演，结识了瑞典籍科学家比雷尔（Biger Blomback），比雷尔和文中是老相识，那天也去了音乐会。三年后，文中得知我们要结婚的喜讯开怀大笑说：“当初我可没有意思要当红娘，现在你要流放到西伯利亚去，将来可不能怪我啊！”我笑答：“就当是你的音乐，扮演了我们的红娘罢了！”结果我们收到了文中夫妇结婚礼物，四个手绘如云又似雾的彩盘，好美！如今睹物思人，更要好好珍藏。比雷尔于2008年告别人世，我和他有超过三十三年相守的岁月，夫复何求？

婚后，文中夫妇和蔡文颖夫妇，我们三对经常找机会聚，大家无话不谈成了“自家入”。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一

1965年7月23日，高二适《〈兰亭序〉的真伪驳议》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后，一场关于《兰亭序》真伪的论辩开始了。由郭沫若引起的“兰亭论辩”，因毛泽东的关注，众多学者的参与，成为社会和学术界的热点。论辩双方均有拥趸，只是与郭沫若持论一致者更多，发表文章也容易，高二适通常有力不从心之叹。

在一个特殊的氛围里期待与憧憬的高二适，对自己的支持者格外珍惜。他的文章发表不久，接到读者张效彬的来信和著作，不仅对高二适肯定《兰亭序》的论点予以赞扬，还鼓励他与郭沫若继续论辩。此时，高二适对张效彬陌生，他翻阅了张效彬寄来的几本书，感觉此人非等闲之辈。

张效彬的确不是公共视线里的“红人”，几部论述传统文化的著作，在那个年月不合时宜，很少有人问津。但是，我们不能忽略他的存在。既然把“兰亭论辩”视为一个文化兴奋点，就证明张效彬的趣味与见识不同凡响。

的确如此。张效彬，名珩，字效彬，号敬园。1882年出生于河南固始，父亲张仁麟，光绪二年进士，《清史稿》有传。他与高二适通信，予以声援，已是83岁的老人了。他躲在京城一隅，冷窥天下，没有几个人知道他是谁何人也。不过，弹去张效彬身上的浮灰，对他的人生过往稍事聚焦，就会看到一个人的丰富多彩。张效彬20岁中了秀才，22岁考取河南公费留学英国，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六年，攻读政治经济学，获学士学位。清宣统三年回到北京，经过考试，被清廷授予政法进士，在京师法政专门学堂任教。辛亥革命以后，到北洋政府外交部工作，曾在苏联驻节5年，先后在圣彼得堡等城市担任领事。彼时国困民穷，驻外使节的日子也不好过，张效彬为侨民利益奔走，经常自掏腰包，撑持领馆门面。1928年冬天，他与妻子一同回国，辞去公职，在北平定居。1929年开始在辅仁等私立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、中国财政史。1932年，被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陈岱

“兰亭论辩”中的隐身人

张瑞田

孙聘请，担任兼任教授，讲授中国财政史课程。

尽管张效彬是剑桥大学的高材生，对亚当·斯密、李嘉图等人的学问具有较高见识，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却情有独钟，教席一侧，寝馈儒学研究，先后写作《大学浅学》《青年必读》《孔子真谛之一孔观》《华夏传统思想习惯考略》等八部专著，合称《敬园丛书》。同时，秉承家学，戮力收藏，名动江湖。在清华大学老校友李家斌的笔下，张效彬栩栩如生：“张师博学鸿儒，对于中国自商以来三千余年之财政史，如数家珍，而配合教材，常以其家藏之古物，如商鼎周铜之类相示。中国财政史本属选课，然每次上课，座无虚席，听者动容。课余，张师常邀学生至其家茶叙，其家藏中国文物、古玩玉器，自商朝以至明清，琳琅满目，犹如一小博物馆。师母俄籍，精通英法俄各种语文，独不懂华语，招待茶点，穿梭其间，谈笑风生，构成一幅中西合璧之画面。”

作为收藏家，张效彬可圈可点。他倾心明画，董其昌、文徵明、仇英、唐寅、王蒙、倪瓒等人的作品，在他家随处可见。他也心仪青铜器、玉器、古玩。日伪时期，他在琉璃厂一掷千金，购得安阳新出土的提梁卣。这是一个三角青铜器，高度一尺五，形状奇异，有流畅的花纹，底部有“纣王四年”四字，是彼时出土的第二件铸有年号的青铜器。张效彬一见倾心，卖掉房子，以5000块大洋得手。张效彬此举，震惊北平收藏界。张效彬把提梁卣带到重庆，即刻产生轰动效应，有人出巨资购买，被张效彬回绝。抗战胜利后，郭沫若、陈叔通、竺可桢等人亲往张家欣赏提梁卣，由此可见提梁卣的价值。解放后，他在故宫博物院有一个闲差，协助相关人士鉴定文物。余下的时间临帖写字，静观古玩，品读拓片。我看过张效彬的书法，多是留在拓片上的题跋，结字整饬，笔法洗练，点划明朗，意味隽永，隋唐碑刻书迹的真髓跃然纸上。张效彬考中秀才，这条信息告诉我们，他是从毛笔的书写中参透中国文化的深奥。也是从毛笔的书写中参透中国文化的深奥。

他是历史缝隙中的人了，他留下的寥寥可数的墨迹，不是临习的范本，更不是收藏的焦点，仅是一位文化老人的兴趣表述。然而，细读张效彬的书法，我怦然心动，它是张效彬的兴趣表述，也是现代书法的重要存在。虽然沉寂于时代的暗角，其文化光辉依然明亮。

张效彬的生活俨然旧时的文人的生活，独对古贤，不染名利，在静谧的时光里安度晚年。悄然展开的兰亭论辩，让他的精神为之一振，他阅读了郭沫若、高二适等人的文章，他认为高二适所言正确，《兰亭序》不是伪作。于是，他提笔作札，表明立场。

高二适沉迷在临帖的“论辩”情绪之中，接读张效彬的手札，有一点激动，致函章士钊说明：“再有张效彬（号敬园）先生突由京寄适一函，今日又由其中表兄弟（鄂彤）送来张之敬园诗稿存及孔教著作，此乃有心人者。公示之未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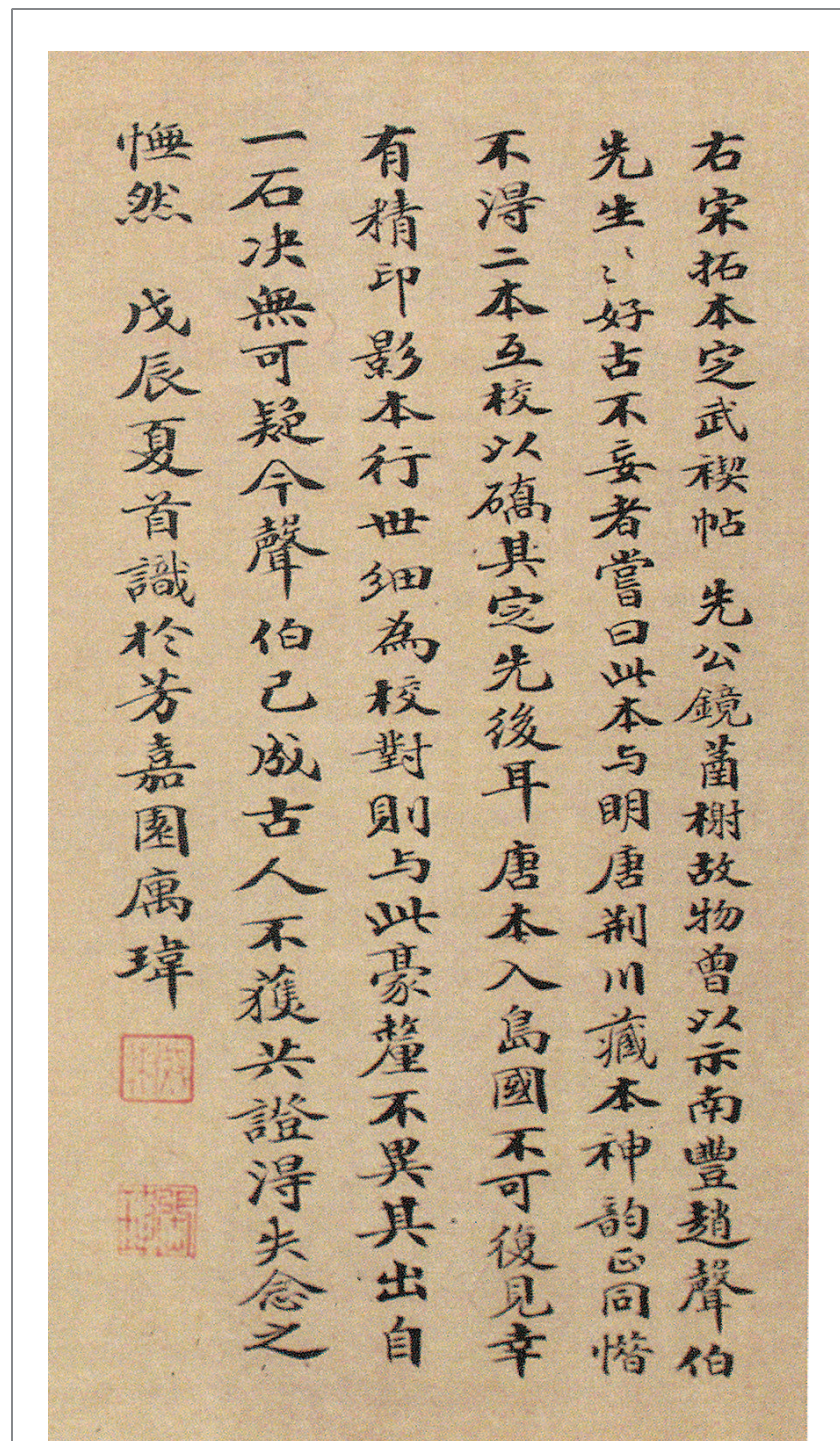
章士钊也在英国留学，与张效彬一样，曾是北洋政府的“公务员”，彼此应该认识。可是，章士钊没有直接回答高二适的问题，并且暗示高二适，与遗老们接触要有分寸。的确，世事纷杂，1957年反右，章士钊几乎罹难，是毛泽东推荐高二适的文章，虽然如愿以偿，但，学界波谲云诡，不能掉以轻心。章士钊的心绪，高二适不太明白，他依然向恩师提及张效彬。1965年9月4日，高二适在致章士钊的手札中又说：“北京八十四翁张效彬再来函，要适绳约纠谬，全在大力云云。足见郭之召周致侮，天下士将群起而攻之矣。”张效彬深爱《兰亭序》，论辩《兰亭序》真伪，他自己没有发言机会，寄希望高二适据理力驳。他把一些资料寄给高二适，其中有启功论述《兰亭序》与王羲之的文章。1965年11月，高二适与章士钊手札，再一次提及张效彬：“敬园老虽卓然，其善适长函可存。阅毕希还，驳文要引用其语也。”高二适难以把控“兰亭论辩”的高昂情绪，让章士钊不知说什么才好。11月10日，《评新编历史

剧《海瑞罢官》发表，章士钊嗅到了新的政治烟云，也有了不祥的预兆。因此，高二适在11月13日、14日、15日、17日的致他手札，均未回复。

对于章士钊的“冷落”，高二适不知何故，他再一次寄呈诗札《兰亭文寄京久不得音耗，以诗代问孤桐老人两首》，表达心境：“闭门何事镂心肝，得失秋毫付一叹。自矜临文非善铸，谁今下泪警狐寒。同仇敌忾人休敌，恋阙丹忱尚尚丹。未识区区当世士，只容灌艾不滋兰。寒炉拔火病难胜，起为幸怀有怒嗔。衰草也怜南雁度，破窗惟益北风寒。从今岁月堪堪老，未必文章占上层。幸得闭门吟咏好，及春愁思也临冰。拙句频发，供公一笑。兰亭文战可告大戡，而可自承胆败耶。二适叩呈。12月26日。”

论辩兰亭的雄心勃勃，似乎有了转变。我是在张中行《负暄琐话》一书中，知道张效彬的。张中行与张效彬比邻而居，彼此熟捻，他以白描的手法勾勒出张效彬的轮廓，清晰而完整。只是没有提及他在“兰亭论辩”时的心态和行为，或许张中行不知道他与高二适联络的过程。在张中行的笔下，我看到了张效彬人生的最后一页，这一页与“兰亭论辩”的时间很近——“那是一九六六年的八月，……有一天，入夜，听见西院吵吵嚷嚷。我们静听，知道是自西而东，抄家到了这里。人声嘈杂，听不清。中夜前后，声音稀了，听见有人问：‘说！枪毙在哪里？’答语：‘我一生手没沾过枪，确是没有。’是张效彬的声音。第二天早晨，开来两辆卡车，装运抄没的文物。后来妻邻人说，张老先生真有修养，许多古董是他用报纸包，用绳捆，并嘱咐千言好好抱住，交给国家，运走的。”

张效彬的夫人是苏联人，自然被怀疑成间谍，老夫妻双双入狱，1968年，张效彬与夫人先后去世。“一晃十几年过去，文物由后代捐献，可见冤狱已经平反。虽然死者不再能知道，我总要为他们庆幸，应该安息的可以永远安息了。”张效彬的事情，张中行讲得还算详细。



书法 张效彬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二维码



谈艺录